

魏晋南北朝 文论全编

穆克宏 郭 丹 编著

(修订本)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

(修订本)

穆克宏

郭丹 编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 / 穆克宏, 郭丹编著. —2 版.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 3
ISBN 7-5343-2895-0

I. 魏... II. ①穆... ②郭... III. 文学理论—中国
—魏晋南北朝时代—文集 IV. I206.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7805 号

书 名	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 (修订本)
编 著	穆克宏 郭 丹
责任编辑	王许林
出版发行	江苏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星光测绘科技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扬州市运河西路 215 号 电 话: 0514-7231836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7.75
插 页	3
字 数	421 000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2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001-3 150 册
书 号	ISBN 7-5343-2895-0/G·2618
定 价	32.80 元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 8008289797
批发电话	025-83249327, 83249091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欢迎邮购,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作者简介]

穆克宏，江苏省南京市人，1930 年出生，1953 年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福建师大古籍研究所所长。现为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郑州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文选》学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文论学会顾问、国家古籍重点项目《文选汇注》顾问、福建省文学学会顾问等。著作有《玉台新咏笺注》（点校）、《文心雕龙选》、《文心雕龙研究》、《滴石轩文存》、《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昭明文选研究》、《文选旁证》（点校）等。发表论文多篇。

郭丹，福建省龙岩市人，1949 年 12 月出生。1987 年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诗经》学会理事。已出版《春秋左传直解》、《古代文学精华》（论文集）、《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左传国策研究》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

寶儀封人
楚狂接輿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

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
干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

情應劭曰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

不同史記曰况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

欲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

聲又曰情發於聲六義所因四始收繫升降謳謠紛披

風什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

詩題曰鹿鳴之什說者云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虞書

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文賦

余每觀材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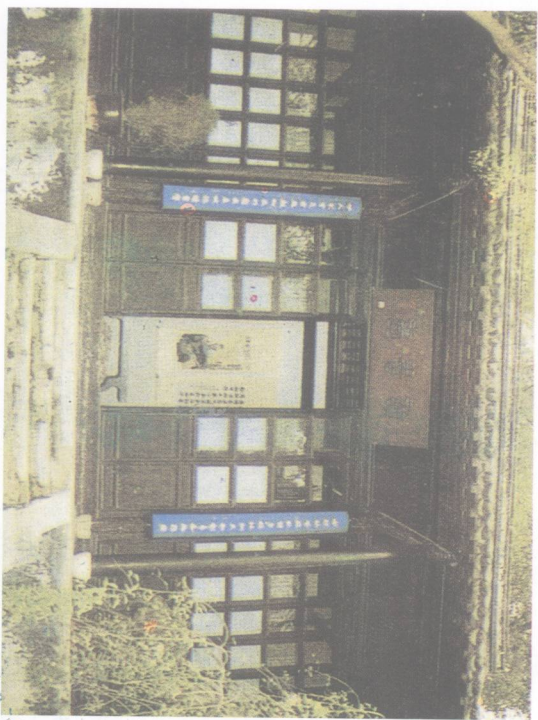
失其放言遺辭良多變矣妍

蚩好惡乃心而之每自屬文尤見

其情恒忠意不稱物亦不逮意蓋

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

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



▲江苏镇江招隐寺昭明太子萧统读书台



竹林七贤图(局部)唐代孙位作

魏晋南北朝文论的新发展

(代前言)

穆克宏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魏晋南北朝的文论有着新的独到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单篇文学论文增多,而且内容也扩大了。同时,文学理论专著如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产生。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的这些光辉成就,表明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重要发展阶段。

魏晋以来,儒家思想有所削弱,法家、黄老、玄学、佛学等思想都曾受到重视。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挣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加上最高统治者对文学的青睐,形势十分有利于文学创作的发展,而文学创作的实践,必然促进文学理论的发展。这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兴盛的主要原因。

魏晋时期的文论,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提到的有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玚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以及刘桢、陆云、应贞等人关于文学的议论。兹分述于下:

曹丕的《典论·论文》。这篇论文是曹丕学术专著《典论》中的一篇。《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说:“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裴松之注引《魏书》曰:“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这说明曹丕著作甚丰。注又引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餉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可见曹丕对《典论》是十分重视的。《典论》全文已经失传,传下来的《论

文》篇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著名的文学论文。

在此之前的汉代的文学论文，往往是论述一部书或一种文体，而《典论·论文》的内容扩大了，涉及到几个方面的问题，显然这是新的发展。

《典论·论文》论述的内容有：

文学批评的态度。曹丕指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造成文人相轻的原因是“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缺乏自知之明。曹丕认为要自己看清自己，这样衡量别人，能免除“文人相轻”的痼疾，所以才能写作这篇论文。至于“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暗于自见，谓己为贤”，也是造成不能正确进行文学批评的原因，理应加以克服。

对作家的评论。曹丕对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所谓“建安七子”都有评论，认为他们“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虽然自以为如此，而客观上总是有高下之分的，就是作家本身也自有其优点和缺点。曹丕认为王粲和徐干都长于辞赋，其成就虽张衡、蔡邕不能超过。其他作品就差一些。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的成就在当时是杰出的。应瑒的文章平和而不雄壮，刘桢的文章雄壮而不精密。孔融的气质才性高妙，有过人的地方，但不善于立论。他的文章辞过于理，甚至夹杂了一些嘲戏的话。至于他擅长的文章，可与扬雄、班固相比，这些评论都是从他的“文气说”出发的。

文气说。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这种气，表现在作家身上，是气质才性。表现在文章里，是风格。气有清有浊，即有阳刚之气和阴柔之气。这在文章里就形成了俊爽超迈的风格和凝重沉郁的风格。风格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曹丕只是强调作家的气质才性，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文体的分类。曹丕把文体分为四科八类，它们各有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曹丕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首次提出文体分类，虽然比较简单，但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他说：“诗赋欲丽”，也点出了建安文学新的发展趋势。
文学的价值。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把文章看作治国的大事，具有不朽的价值。当时统治者如此重视文学，无疑对文学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这些内容体现了建安文学的时代精神，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有深远的影响。曹丕另有《与吴质书》一篇，其中对“建安七子”的论述，与《典论·论文》中的论述完全一致，可以对照阅读。

曹丕的同母弟曹植是建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他的《与杨德祖书》也提到了建安文学诸子，并对文学批评发表了意见。他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这是主张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及时修改自己的文章，以臻于完善。这个意见当然是对的，问题是他又主张：“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并批评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摘摭利病。”这样混淆创作与批评的界限就不对了。这样说，实际上拒人于门外，如何虚心接受批评呢？

曹植说：“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表现了对民间文学的重视。但是另一方面，他却轻视辞赋，这一不正确的观点遭到他的好友杨修的反驳。

应场的“文论”，黄叔琳注云：“应场集有《文质论》”（《文心雕龙辑注》卷十）范文澜注引《文质论》全文，又说：“此论无关于文，姑录之。”看来是不可靠的。但是，究竟指什么文章，由于应场的作品散失很多，现在已无法确知。

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论文。《文赋》的写作年代，杜甫《醉歌行》说：“陆机二十作《文赋》。”此说别无佐证，似不可信。今人逯钦立等人认为是陆机四十岁以后的作品，根据也不足，但可供参考。《文赋》究竟写于何时，现在已无法确定。

《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的文学创作论。这篇文章用赋的形式，对文学创作过程进行了比较生动、详细的论

述,还论述到风格和文学创作的一些技巧问题。这是陆机对前人和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又一新的发展。

《文赋》的主要内容是论述文学的创作过程。一开始是讲创作的准备:“颐情志于典坟”,是说要学习古代典籍;“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是说要观察一年四季的景物;“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是说要心怀高洁。做好这三方面的准备工作,就可以进入创作过程。

进行文学创作,有一个艰苦的构思阶段: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沈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陆机以生动的语言,对文学创作的构思过程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在构思开始的时候,不看不听,深深思索,广泛探求,心神飞向极远的八方,遨游在万仞天空。在构思成熟的时候,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由朦胧而越来越鲜明,物象清晰而纷至沓来。于是倾注诸子百家的精华,熔铸六经的文辞。想象有时好像在天池里安稳地漂流,有时如同在地泉中洗濯浸泡。有时吐词艰涩,好像游鱼衔钩,从深渊中慢慢地提出水面;有时词藻涌来,如同飞鸟中箭,从高高的云层中急遽地掉下来。收集百代的阙疑文字,采用千年遗留的音韵。抛开前人用滥的意和辞,就像抛弃已开过花朵。采用前人未用过的意和辞,就如开启未曾开过花朵。片刻之间可以洞察古往今来的历史,一眨眼的工夫能够观尽天下的事变。在构思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想象的巨大作用,无怪乎黑格尔说:作家“最杰出的

艺术本领就是想象”。(《美学》第一卷 357 页)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还有灵感问题。陆机说：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晻遽，唯亮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乃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览营魂以探蹟，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是故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优。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

陆机对灵感的开塞来去描写得形象而又深刻，非深知其中甘苦的人是无法道出的。他认为灵感来的时候是挡不住的，去的时候是阻止不了的。藏起来如同影子消灭，出现时好像声音响起。在灵感涌现时，没有什么纷乱的思绪是理不清的。文思发于心中如同疾风，文辞流于唇齿如同涌泉，丰富多彩的文思，你只要用纸笔去写好了。写出来的文章，文采妍美满目，音韵清脆悦耳。在灵感闭塞时，心志散去，精神滞留。呆呆地像枯死的树木，空空的如干涸的河流，虽然竭尽心力探索奥秘，提起精神自去寻求。但是，文理不明更加隐伏，文思难出如同抽丝。有时竭尽心神反多悔恨，有时信笔写来倒少谬误。虽写文章在于我，然实非我力之所能及。所以我常抚空怀而自叹，弄不清文思开塞的根由。陆机对艺术构思过程中的灵感现象的描述是比较真实和客观的，作为灵感理论的开端，它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他把灵感归之于“天机”，即自然天性，这显然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文赋》主要是讨论艺术创作的构思问题，也谈到结构、剪裁、文体、风格、语言等问题。陆机在论述艺术构思之后，也提到了结构问题。他说：“选义按部，考辞就班。”即选择事义，考究文辞，使之按部就班，就是安排好文章的结构。结构是由内容决定的，得根

据内容表达的需要进行安排。内容不同,结构也就多种多样。陆机说:“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这里以生动的比喻,描述了六种不同的结构方式。这只是举例说明问题,并不是说结构的方式只有这六种。陆机在讨论结构时,特别强调“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这种以内容为主干,以文辞为枝条的思想,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有的研究者将陆机看作形式主义文学理论的创始人,是很不公平的。

一篇文章的好坏,和剪裁的关系极为密切。文章往往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毛病,正如陆机所指出的:“或仰通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遇到这些情况怎么办呢?用剪裁的方法去掉毛病,就可以成为佳作。不然则为劣品,所谓“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文章剪裁是一项细致的工作,陆机提出:“考殿最以锱铢,定去留于毫芒。”经过衡量,文章如仍有不当之处,就要根据法度,加以纠正,使之恰当。

至于语言,陆机认为:第一,要讲究韵律。他说:“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就是说,文章要立意尚巧,遣辞贵妍。至于语言的音调声韵变换,好比五色的相互配合。如果不按韵律乱凑,往往会首尾颠倒,如果乱了五色的次序,就显得污浊而不鲜艳。可见陆机是重视语言韵律的。第二,要有警句。他说:“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陆机特别强调熔铸警句,他认为虽然众多的文辞都有条有理,但是,必须依靠警句方能发挥作用。这样做利多弊少,所以就这样做,不再有所更易。第三,要有独创性。他说:“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又说:“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这里强调创作的独创性。陆机明确地表示,要反对因袭,要避免雷同。当然以上引文皆兼指意与辞两个方面。不过,从这里亦可窥见陆

机对文学作品语言运用的主张。

陆机关于风格和文体的论述,比较值得我们注意。

曹丕《典论·论文》对“建安七子”的评论和对文气的分析已经涉及作家的气质才性和作品风格的关系问题,但这仅仅是开始。陆机对风格的认识,显然前进了一步。他说:“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意思是说,文体千差万别,风格各人各样。这是由于作品反映的客观事物是千姿百态的。这纷纭万状、变化迅速的客观事物是很难描写的。陆机把文体、风格和客观事物联系在一起,说明文体和风格的多样性。这一见解是十分卓越的。他又说:“故夫夸日者尚奢,愜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好夸张炫耀的人,崇尚浮艳;要求描写恰当的人,重视精当;讲究穷形尽相的人,表达酣放;议论通达的人,作品宽阔、开朗。作家的性格、爱好不同,作品的风格则各异。陆机关于作家的性格和作品风格关系的论述,显然受到曹丕《典论·论文》的启发。不过,他的论述仍然比较简略、概括。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风格论,直到刘勰才进行了系统的探讨。

曹丕《典论·论文》把文体分为四科八体,而陆机分为十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烨而谄诤。”在文体分类上,陆机显然也前进了一步。对于文体特点的分析,曹丕粗略,陆机则较详。例如诗赋,曹丕笼统概括为:“诗赋欲丽”,陆机则分别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其进步是显而易见的。

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对我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都有很大的影响。朱自清说:“‘诗言志’一语虽经引申到士大夫的穷通出处,还不能包括所有的诗。……‘言志’以外迫切的需要一个新标目。于是陆机《文赋》第一次铸‘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诗言志辨·诗言志·作诗言志》)因此,在古代诗歌创作

方面,就有所谓“言志”派,“缘情”派;在古代诗歌理论方面,就有所谓“言志”说,“缘情”说。历代学士文人对此多有评论。如明人谢榛说:“绮靡重六朝之弊。”(《四溟诗话》卷一)胡应麟说:“‘诗缘情而绮靡’,六朝之诗所自出也。”(《诗薮》外编卷二)清人汪师韩说:“以绮丽说诗,后之君子所斥为不知理义之所归因也”(《诗学纂闻·绮丽》)或褒或贬,说法不一。我们从文学史上来考察,发现陆机的“缘情”说,确实揭示了诗歌的一些创作规律和艺术特征。因此,它不仅对六朝诗歌有直接的影响,而且,对唐代诗歌的繁荣也起了一定的间接作用。

晋代还有两部文学总集——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是值得一提的。这两部总集,既选录了作品,又有评论,都表达了编者对文学批评的意见。

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据《晋书·挚虞传》的记载:“(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这是说挚虞分类选录了古代诗文,并附有评论。《隋书·经籍志·总集类》云:“《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文章流别志论》二卷。”这里的记载就更清楚了,前者为作品选,后者为评论集。可惜的是二者均已散佚,现存的只有《艺文类聚》等类书载录的《志论》十余条。这些残篇已被清人严可均收入《全晋文》卷七十七。现存的佚文,基本上是论述文体的。论及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等,其文章分类与后来的《文心雕龙》、《文选》颇为相似。挚虞论文体,或说明文章的性质,或叙述文体的源流,或评论其利弊,颇有一些可取的见解。例如:

赋者,敷陈之称,古诗之流也。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楚辞》之赋,赋之善者也。故杨子称赋莫深于《离骚》。贾谊

之作，则屈原侔也。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

这一条是论赋。首先说明赋之源流，然后指出孙卿、屈原的赋，“颇有古诗之义”，即“发乎情，止乎礼义”；批评了宋玉“淫浮”的毛病。关于汉赋，他肯定了贾谊，批评了“辞人之赋”。他认为“辞人之赋”有“四过”，即：“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和“丽靡过美”。挚虞的评论，虽然是从正统的儒家思想出发的，但是不乏卓见，对后世文论如《文心雕龙》等颇有影响。所以明人张溥说：“《流别》旷论，穷神尽理，刘勰《雕龙》，钟嵘《诗品》，缘此起议，评论日多矣。”（《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挚太常集题辞》）

李充的《翰林论》。据《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记载，“《翰林论》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有人推测，《翰林论》三卷所收为评论。五十四卷的或名《翰林》，专收作品。与挚虞《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志论》的形式相似。《翰林论》已亡佚。现存佚文十余条，散见《太平御览》等类书。严可均收入《全晋文》卷五十三。现存佚文多论述文体，例如：

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

研玉（核）名理，而论难王马（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矣。

在朝辩政而议奏出，宜以远大为本。陆机议晋断，亦名其美矣。

以上三条论述表、论、奏等文体，皆以作品为例，概括文体的特点，比较简略。也有论述作家作品的，例如：

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
木氏《海赋》，壮则壮矣。然首尾负揭，状若文章，亦将由未成而然也。
应休璉五言诗五百十篇，以风规治道，盖有诗人之旨。

这里，论述潘岳文、应璩诗和木华《海赋》的思想、艺术特点，不无特见。如论潘岳一条，就曾为钟嵘所引用，并被钟嵘作为“笃论”。但是，与挚虞所论相比，显然不如挚氏详赡。

刘勰提到的魏晋时期文论作者，尚有刘桢、应贞和陆云。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他论文章的话，仅存刘勰《文心雕龙》引用的两条。《风骨》篇引：“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念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刘桢认为孔融是卓越的，确有与众不同的气质，他文章的优点，恐怕难以超过。《定势》篇引：“文之体指实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余，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这是说文章的体势有强有弱，能做到文辞已尽而体势有余，天下一人而已，是不可多得的。很显然，刘桢论文是重视作家的气质和文章的体势的。

应贞，字吉甫，应璩之子。严可均《全晋文》辑其佚文九则，不见论文之语。

陆云，陆机之弟。陆云《与兄平原书》三十五篇，颇多论文之语。例如：

云今意视文，乃好清省，欲无以尚，意之至此，乃出自然。

《文赋》甚有辞，绮语颇多，文适多体，便欲不清，不审兄呼尔不？

张公文，无他异，正自清省无烦长，作文正尔，自复佳。

有作文唯尚多，而家多猪羊之徒。作《蝉赋》二千余言，《隐士赋》三千余言，既无藻伟体，都自不似事，文章实自不当多。

古今之能为新声绝曲者，无有过兄，兄往日文虽多瑰铄，至于文体，实不如今日。

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洁而不取悦泽，尝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微多，但清新相接，不以为病耳。

张溥指出：“士龙与兄书，称论文章，颇贵清省，妙若《文赋》，尚嫌‘绮语’未尽。又云：‘作文尚多，譬家猪羊耳。’其数四推兄，或云‘瑰铄’，或云‘高远绝异’，或云‘新声绝曲’，要所得意，惟‘清新相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陆清河集题辞》）贵“清省”，重“清新”，可见陆云论文宗旨。陆云关于文章的论述，比较零星，不成系统，刘勰虽然提及，但是，还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南北朝的文论，有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标志这种成就的著作是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

刘勰是南朝齐梁时代的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心雕龙》，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南齐以前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经验，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文论著作。

《文心雕龙》十卷，分上、下编，共五十篇（其中《隐秀》一篇残缺）。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一、“文之枢纽”五篇，即《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这是总论部分，表达了《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文心雕龙》的序言《序志》篇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意思是说，他的《文心雕龙》写作的基本原则是，以道为本，以“圣人”为师，以儒家经书为楷模，参